



介紹 兩部 令中國官方側目的書

《毛澤東後的中國》

無聲

毛澤東的逝世，「四人幫」的倒台和華鄧的接管中共政權等的一系列的重要轉變，除了對國內起著巨大的影響外，亦使西方毛派產生嚴重的分裂。渾深的蘇聯研究專家CHARLES BETTELHEIM在七七年辭退其中法友好協會的主席一職，只是其中較受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注意的其中一項。美國的馬克思主義刊物「每月評論」MONTLY REVIEW，把BETTELHEIM辭職所帶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一場辯論，輯成「毛澤東後的中國」一書，其中包括BETTELHEIM的辭職信，NEIL BURTON（一個在中國工作的中法友好協會的成員）的「為新政權辯護」和BETTELHEIM系統地批評現中國政權的「大躍退」三篇文章。這三篇文章雖然在理論和分析中國的社會現實方面，並沒有甚麼獨特的見解，但卻頗能代表西方毛派分裂的背後思想。BETTELHEIM的「大躍退」一文，亦對我們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去反省和評價華鄧的新政權，有一定的幫助。

BETTELHEIM的辭職信，由於是以公文的形式寫成，因此只能簡略地提到對現時華鄧政權的批評，和他辭職的理由。NEIL BURTON駁斥BETTELHEIM辭職信的「為新政權辯護」一文，整篇都是從經驗和現象層面出發，例如大談中國人民如何為打倒「四人幫」而歡呼，華鄧等出版十大關係和毛選五卷是在發揚毛澤東的路線等，及為新政權的各種政策作出一些猜測性的解釋，卻無法合理地解釋這些現象產生的原因。

BETTELHEIM的「大躍退」一文，可說是全書最有份量的一篇文章，他系統地批評了華鄧的多項政策，並指出這些政策是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原則的。他首先批評了華鄧政權對「四人幫」的批判，完全是從個人的私生活和弄權等角度出發，而沒有正面去分析「四人幫」的社會階級背景和面對「四人幫」的理論（如資產階級法權，黨內的走資派等）。他們一方面高舉毛澤東的路線，但在實際上卻宣佈毛澤東所發動的文革的結束和放棄文革所帶來的多項政策。例如在工廠裏放棄「三結合」和其他令工人有參與性民主的措施，而單方面強調廠長和領導作用，強調工人應服從紀律，完全放棄讓工人當家作主的這條社會主義原則。在教育領

域中再次強調成績和考試，回復到文革前的教育政策，使大部份得進大學的學生都是黨員和知識份子的子女，大大地削弱了工農兵子女接受教育的機會。在生產方面強調社會主義企業必須獲取更大的利潤，認為利潤越大則社會主義的財富便越多，但單方面強調利潤，而並不考慮人民和社會的實際需要，實在是違反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最重要的前題。上面所舉的幾點，只是BETTELHEIM批評華鄧政策的其中部份，其他如外資，發展農業，鼓吹科技中性的說法等一系列的問題，他亦有著頗為詳盡的批評。

新政權除了實施種種違反社會主義原則的政策外，更嘗試從理論方面否定毛澤東思想。BETTELHEIM認為由於毛澤東在群眾中長期以來所建立的聲望，因此新政權還須要利用毛澤東思想的名義來進行統治，只能暗中地歪曲和取代毛澤東思想。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片面地歌頌文革前的成就，否定文革對共產黨和中國社會所帶來的影響。此外，新政權為了要鞏固其統治和保存其既得利益，提出「社會主義制度」來代替一路沿用的「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社會」，藉以否定在這時期的社會中仍存在著階級鬥爭，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問題。BETTELHEIM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說法，實在與史太林和其他蘇聯的修正主義者所提的「社會主義生產模式」，都同樣是掩飾了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為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鋪路，「社會主義制度」這種說法把「社會主義所有制」（即指由人民真正控制生產資料）與「國家所有制」混為一談，因此我們可以從討論「十大關係」的第七次研討會中，找到像「既然工廠是由國家所控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工人與工廠的關係，是已包括在工人與國家的關係之內。（註）」這套說法的最主要作用使人相信，既然工人是「國家的主人翁」，因此工人亦是「工廠的主人翁」，那麼工廠的命令理應包含了他們的意志，工人理應遵守工廠所訂下的所有紀律。BETTELHEIM認為「四人幫」的資產階級法權和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的階級分析理論，雖然仍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最少亦是嘗試從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對現時的中國進行分析，總比新政權所提出的一套自圓其說的理論來得合理。

BETTELHEIM在分析毛澤東死後出

現「大躍退」的原因時，認為這並非由於「四人幫」經濟政策的失敗，而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沒有一套較完備的關於中國社會的階級分析所至。共產黨在建國後一直都採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由毛澤東所提出的一套過時的階級理論，因此不能正確處理在不同時期的工農和進步知識份子的合作問題（特別是知識份子），和怎樣從根本地改變社會和經濟關係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等。此外，由於沒有正確的階級分析，因此往往只能把敵人冠以資產階級、地主、富農和反革命份子等名稱，無法清楚地向群眾交代各次鬥爭的性質和在中國社會裏的階級矛盾，使部份群眾錯誤地認為這些鬥爭只是與他們無關的上層權力鬥爭；大大地削弱了各次政治運動對群眾的教育作用。

BETTELHEIM對「四人幫」路線的支持，無疑是反映了他對中國的了解，只是從抽象的原則出發，未能真正了解中國的現實。筆者實在無法同意「四人幫」時期在經濟方面的表現不俗，我們只須稍為留意中國的生產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便可知到文革後的經濟增長緩慢，無法在不斷人口膨脹的壓力下改善人民的生活。他批評新政權的部份論點，其實亦可適用於批判「四人幫」，例如他認為新政權強調廠長在工廠中的合法權力，是剝削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但「四人幫」時期的幹部和革委會的專橫，政治運動的由上而下等，又何嘗是人民當家作主的表現？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後沒有發展出一套科學的階級分析理論，其實主要的原因並不是在於理論的落後，而是這套理論必然會暴露出官僚階級（無論是「四人幫」還是華鄧政權）與人民的矛盾，動搖了整個官僚階級的統治。我們從共產黨對自發群眾運動的多次壓制，先是文革後期對「極左」派的鎮壓，到四五天安門事件，及至最近的魏京生和傅月華事件，都可看到兩派的官僚雖然在國家政策上有著不同的傾向，但對於人民批評共產黨卻同樣是採用鎮壓的手段來對付。

BETTELHEIM把「四人幫」界定為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者，雖然是犯了嚴重的錯誤，但就其分析華鄧政權的政策，指出其不符合於社會主義的原則的多項批評，都是每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會同意的。如果你是基本上讚成現政權統治政策，你頂多只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卻絕對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中國的共產黨、解放軍和人民羣衆》

林質道

四九年解放戰爭的順利完成，肯定是當代中國歷史發展的轉捩點。世紀以來，中國陷於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形態，到此已窮途末路，而長期的軍閥割據、社會解體的動盪局面，看來也註定一去不返了，中國自此已進入新的歷史進程：舊社會的改造和新社會的締建。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角度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義，又豈只是中國社會山窮水盡後的柳暗花明。中國革命的勝利的歷史意義，在於打擊帝國主義在東亞的侵略和控制和拉勻共產集團和反共集團的力量對比，更示範着落後國家革命奪權的新形式，大大地鼓舞着二次大戰後世界各處共產主義運動的成長。

但解放舊社會與創建新社會始終是兩回事，三十年來的反覆轉折，是使人擔憂的。政治運動的火紅燄烈、內外政策的改轍易轍，以至人事組織的變動莫測，在在都可以作為四九年後中國社會演變的突出標記。在毛澤東思想旗幟的高舉下，深入又廣泛地調動了大江南北過百萬的人民羣衆，以最直截了當和果敢的奪權形式，推翻日漸根深蒂固的修正主義路線，這是理想主義的最高峯、最狂熱的表現，也具體地實踐了人民民主的精神。但文革在黨中央的控制下結束，也同時意味着文革的天折。“象徵”着文革的四人幫，在毛澤東死後不久，竟一夜之間在一場宮廷政變後被推翻下台，而黨中所採用的斷然的行動，也確實頗得人心的。到底我們應該怎理解“文革—四人幫—華鄧—黨中央—人民羣衆—修正主義”彼此間的複雜關係？再加上五、六十年代間與蘇聯在共產主義／修正主義的問題上產生無法和解的分歧，令中國外交政策產生近乎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七十年代以來更單求團結第二第三世界現政權而不計較其國家性質是否反動。至中美建交無疑是清晰地表明了中國所採取的，不過只是一種以抵禦蘇聯為主要任務的民族主義外交政策，與國際主義完全是兩回事。

對於中國內外政策所作出的大幅度的轉變，必須作出科學的分析及批判，否則唯心主義的解釋也就難免充斥市面。李維奧·美頓（LIVIO MAITAN）的『中國的共產黨、解放軍和人民羣衆』就嘗試對這些問題提供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所以該書的副題是『對文化大革命及其後果的馬克思主義解釋』。他對流行的兩種看法頗為不滿，第

一種是持反共立場的中國問題研究者，他們牢不可破地將中國政策的演變的基本動因，都放到當權者的相互攻訐和傾軋方面，而不考慮人民羣衆參與政治運動（如文革）的積極因素所在。第二種就是頭頭是道的跟風派，基本上與拿破崙所說“朕即國家”的唯心主張一樣，緊跟黨中央，“黨中央即人民羣衆”。在這種前提下，黨中央與人民利益不僅沒有衝突，更且是一致的。而黨中央在以往出錯的原因，責任就撥歸黨內某些儲心積慮篡黨奪權的陰謀份子所有，這是一套很典型的陰謀理論。

又或者中共官方會用“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去概括一切分歧、對立，但判斷的標準往往是實用主義（對黨中央有利）的，再加上“黨中央即人民羣衆”的假設，一切黨與民衆的對立，或則被理解為“人民內部矛盾”，或則被理解為阻礙社會主義建設的“敵我矛盾”，人民羣衆在這些指控上就變成擾亂社會公安的破壞者／敵人，而黨中央的正確性卻屹立不倒。

李維奧·美頓反對這類先驗的看法，而指出理解中國政治發展的兩個關鍵：共產黨內部的矛盾，與及共產黨和人民羣衆的矛盾。在『中國的共產黨、解放軍和人民羣衆』，他的論述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總結四九年建國後至文革前，中國的政治發展及經濟建設狀況，並指出一些並未能在此期間加以解決的問題。在經濟方面，包含兩個矛盾：首先是剝削農業成果，以資助工業發展所造成兩者間的矛盾；其次是物質刺激與由此而造成社會差距的矛盾。在政治方面，主要是領導層內部的分裂，而另一方面，人民羣衆由於根本無權過問領導層／共產黨的統治，幹部所擁有的政治及社會特權亦漸次凝固下來。而文革的出現也只有以這個內在發展的角度去分析，才能避免陷入唯心主義的解釋。

第二部份則是全書的核心。在這裏，作者透過研究文革期間工人的角色、共產黨內部的分裂、社會的改組狀況，以至黨中央收復文革的步驟等等，去理解文革的歷程和性質。他指出對被罷免的領導人（鄧拓、陸定一、彭真、陶鑄、鄧小平、劉少奇等）的控罪，事實上都能應用到每個共產黨員身上。可以見得，文革前的社會矛盾，不是黨內部的走資本主義的代理人與無產階級革命的代理人的殊死戰，而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整

體、甚至是一個階層而與人民羣衆相對抗。換言之，毛澤東發起文革以鬥垮一批幹部後，真正的社會矛盾（人民羣衆與黨之間）依然沒有解決，不同的不外是新官代舊官而已。而毛澤東對羣衆運動的曖昧態度，更示範了官僚政治的本質。他一方面發起羣衆投身文革，而另一方面卻極力要將羣衆運動按着自己主觀意圖去發展。所以表面上鼓吹大民主的毛澤東，在對黨和羣衆關係的理解上，畢竟並無二致。最後，他提及九中會議中軍人已取得重要地位的意義，無疑是表示了文革後政治領導的不穩定，而必須尋求軍事實力的背後支持。

第三部份則是檢討文革後中國在經濟、外交及政治方面的表現。他在結論中指出，由於共產黨建立了政治權力完全集中的制度，人民羣衆的地位，根本就不是毛澤東所說“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所以中國社會政治的基本矛盾，就落在官僚專政和人民民主的對立。故此，要實現真正的人民民主就必須進行推翻官僚專政的人民革命。

雖然這本書有着一些明顯的缺點，如缺乏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去理解文革的成因；採用夾敘夾議的形式，順着時序先後，而使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欠缺系統等。但另一方面，他選取文革作為討論中國政治的重心，却是正確的判斷，因為文革前後，是中國社會由四九年後重組的新社會形態的破落點，也是七十年代中國社會的重建點。通過分析中國社會解體和重整的變動過程，來了解影響社會發展的各種力量及因素，確是掌握中國社會性質的具體說明。

作為第四國際領導人之一，李維奧·美頓很清晰地述說了托派對中國問題的基本觀點，而不帶教條和空疏的味道。所以，無論為的是認識中國社會性質、了解文革發展的來龍去脈，還是掌握托派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中國的共產黨、解放軍和人民羣衆』實不失為一本值得推薦的書。